

中国政法大学

主办

名家大讲堂

MINGJIA DA
JIANGTANG

第一辑



大学之讲堂，唯有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包容百家，
弘扬学术，方可称之为“大学”，方可称之为“大讲堂”。

江

编者说明

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名家论坛”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术立校”的一个缩影。自 2005 年创办至今，已经邀请了 130 余位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做客“名家论坛”，不仅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也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在论坛讲演中展示了其学术成就，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学术名家是社会稀缺资源，为使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学术思想，领略他们的学术风采，我们将“名家论坛”演讲整理后，取名《名家大讲堂》公开出版发行。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内容均已征得讲演者同意并经其勘校确定。

序

陈寅恪先生有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以为，大学之讲堂，唯有秉承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包容百家，弘扬学术，方可称之为“大学”，方可称之为“大讲堂”。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举办“名家论坛”已有多年，来自国内外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在这里展示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学术智慧和学术风采，不仅给听众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营养，而且开拓了人们的社会视野，实现了论坛“集四海名家深邃思想，哺法大学子茁壮成长”的宗旨，为我们的大学营造了一个包容百家、弘扬学术的精神殿堂，可称之为“大学之大讲堂”。



目 录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时代主题 / 001

顾海良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审美是人生的节日 / 023

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问题探讨 / 035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 / 053

华 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农业财政的终结 / 085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物权法

——关于物权法的法哲学反思 / 097

张文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 127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问题 / 147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司法制度的变迁 / 163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 / 177

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软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 195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自由、法治和美国宪法 / 223

肯尼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澳大利亚的司法制度 / 251

安东尼·墨里·格里森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知识产权与中国——商务工具及财富的创造者 / 281

伊安·哈维 英国知识产权研究所主席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时代主题

演讲人：顾海良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顾海良，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他的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小组成员、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顾海良教授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思想家，其在学术上的着力点和主要贡献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有较深入的研究，被誉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者”的杰出代表。他主编的《世界市场全书》（获中国图书奖）被誉为展示世界市场的“清明上河图”，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论文两百余篇。

今天，我将要讲的问题，关键词就是“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以后产生的。

第一个观点比较早，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后，有一种乐观派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复兴。当时，我还在人民大学当教授，曾经接待过俄罗斯的一批专家，当时苏共已经下台，这些专家是苏联时期的科学院院士。这时院士也不被承认了，他们就到中国来访问。我曾经问过其中有些院士：“你认为苏共下台，苏东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这个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他当时说了一句他们共同想说的话，那就是：“隧道的尽头是光明。”这就是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的挫折，就像走过一条漫长的公路时经历的一段很短的隧道；过了隧道，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就将得到复兴。因此，他们认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是暂时的。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种“速胜论”的看法。现在15年过去了，原苏联社会主义的“复兴”还没有任何信号。由此可见，“速胜论”或者说“隧道论”，并没有被历史所验证。

第二种观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失败论”的“悲观派”。“完全失败论”的产生有一个时间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苏东的失败是“教条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原教旨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相信社会主义还将在世界得到“复兴”。20世纪90年代这十年，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流行的十年，也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十年。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有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开始改变了，认为社会主义再也不可能得到“复兴”。所以，在

2000年,《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安德森突然“倒戈”,安德森撰文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所有对其制度威胁的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没有一个集体力量能同资本的强大力量相抗衡”;“人类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力将来自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新陈代谢”。安德森以《新左派评论》的观念“更新”为旗号,把该刊几十年来宣扬的理论一笔勾销。长期以来,《新左派评论》是西方最有影响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刊物,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发表了大量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宣扬社会主义思潮和理论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剧变后,《新左派评论》也没有改变原先的基本观点。但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在安德森看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发展资本主义和靠近资本主义似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在他看来,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安全保障和对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力量遏制已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似乎没有给社会主义留下任何意识形态和现实经济斗争的缝隙。安德森等人的观点显然是偏颇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像“9·11”这样突发事件的出现,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更证明这些所谓“更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作“取代论”,本世纪初在南美和北美的一些新兴工业国的共产党,提出“替代”、“取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他们认为用社会主义的旗号去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行的,但可以用替代的方法替代社会主义运动。这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反经济全球化,南美、北美的共产党把反经济全球化作为他们理论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种就是所谓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绿色运动”。反经济全球化和绿色运动可以替代社会主义的理想,成为号召人们反对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有效手段,所以出现了替代社会主义的反全球化运动或绿色运动,以及其他的“新社会观”,或如他们所讲的“新社会运动”。

这三种观点中,“速胜论”被证明是不存在的;15年过去了,“悲观论”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此失败了,这也不是事实;“替代论”认为可以逐渐恢复或“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形成现代的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还占有一定的市场。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在积极推

进，这引起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极大震动。最近，武汉大学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了一次有关国际社会主义的研讨会，会议是以纪念恩格斯逝世 110 周年为主题的。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接触了原苏联共产党的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像巴伐图利亚等，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读大学时，他们的书就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入门书。我们也接触了日本和西欧的一些理论家，共同研究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现在与将来的意义和影响。中国现在所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什么样的启发。他们谈得很有感情。听了他们的许多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积极的。他们认为，中国所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会成为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复兴的旗帜和号角。现在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

今天我想讲的是，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是什么。我打算通过历史回顾，来谈一下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我首先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的词义学的角度探讨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据西欧学者考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从词义学的角度可以反映出两种社会制度发生和发展的特点。英国学者托姆·博托莫尔在一本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比较理论研究的小册子中，有一个注解，说明现代英语中“资本主义”一词收入《牛津大词典》是在 1854 年的修订版中。那么，“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出现，可上溯二三十年，大概在 19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或 40 年代，但不会早于 20 年代。相对于“资本主义”这个词的出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要早得多。在马克思看来，十四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而现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在十六七世纪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这个词，直到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出现。那么，这一历史时期，人们把这一新产生的社会制度叫什么呢？有人叫做“现代社会”，有人叫做“市民社会”、“工业社会”等等。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人们回过来将这个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制度定义为“capitalism”，很准确地用“资本”这个社会的核心内容来

命名这个社会。给这个社会制度命名的时候，这个社会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大家知道，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代，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讲，由此上溯不到100年的历史中，资产阶级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这100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就是这个工业革命期间，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经过这个“非常革命”的阶段，“资本主义”才准确地成为定义这个社会特点的名词。因此，到1854年《牛津大辞典》修订时才首次收录了这个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很少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比较多的还是在《资本论》第一卷讲到资本积累的时候使用这个词。在其他的文献中，马克思也很少使用这个词，英语中流行开了，但在德语中还没有流行。据西方学者考证，最早使用“资本主义”作书名的还是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像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著作。

“社会主义”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书面语言上，据有的学者考证，大约是1827年，和上面所说“资本主义”一词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一词，是以对当时存在的社会的批判意义上来使用的。当时社会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社会的矛盾已经出现，这个社会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福音，但给人类发展带来的祸害也已经显现。特别是1825年英国经历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现实已经出现。有一批学者，我们后来把他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批判资本主义，这时候批判使用的词渐渐确定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制度来批判当时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一词，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也很少使用。我们讲他们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一词在当时才刚刚使用开来。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是以对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用语产生的。这些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使用，并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而提出“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7年。

大家可能记得大卫·李嘉图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赋税论》，是在1817年发表的，他在1823年去世。在这本书中，他预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就出现了经济危机。现实已经打破了他所谓的资本主

义不可能出现危机的说法。19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德国、法国、英国都有工人运动的兴起。到了40年代，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开始把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到了60年代给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奠定了剩余价值的基础，直到70年代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写这本书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很少在正面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共产党宣言》中所有“社会主义”都是贬义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一直到1874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才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他们自称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大家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19世纪70年代以前，他们经常讲的“社会主义者”，指的都是非科学社会主义者；70年代以后，他们把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到了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东方化的同时出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国家用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翻本国的资本主义，开始建立以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将理论变为现实，首先建立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由科学社会主义指导该国的社会革命，或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很多国家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从人类历史来讲，资本主义有了几百年的发展，人们才把这个社会叫做“资本主义”。这其中包括了许多自发的社会实践，包括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历程。但是社会主义的建立与资本主义不一样，它是在一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是在理性地构建一种社会制度。从社会发展史上来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人类社会花费成本最低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过程。不管是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人们建立和维持这个社会的成本是极大极大的。我们回顾一下1648年到1760年这一百多年的历程，资产阶级为了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动荡，整整花费了120年，然后才有了工业革命，才有了经济大踏步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是按照科学理论的指导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以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制度建立中花费成本最低的社会制度，我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所以就有了 19 世纪末落后的俄国成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超级大国，这是它优越性的一面。但另外一个潜在的威胁是，社会主义运动是按照一种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但是，假如将这种科学理论教条化，就可能窒息甚至葬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理论在先，人们假如对这种理论作出错误的理解，进而构建社会，那么这个新社会的生命力将被窒息，这个新社会将可能在教条化理论的指导下走向失败，甚至走向反面。所以这种社会制度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优越性，也有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教条化，会给这种新制度带来致命的打击。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们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了许多教条式的解释，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变成僵化的社会主义。

从词义学的角度，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出现在同一时期。至于出现的背景，前者是一种社会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的定义，后者是作为旧社会的批判用语，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然后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也就是造成这二者区别以及社会制度发展中各自特点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说有很大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当代社会的现实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内涵。用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来指导现实，而不是用已经有的理论原封不动地指导现实。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要与时俱进。

就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来讲，我们假如以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到现在大概有 150 年的历史，我认为如果以 50 年到 60 年为一个时段，从 1848 年到 1895 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 1895 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末是第三个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家知道，经济学中有“长波”理论，他们把经济波动分为三种，“短

波”、“中波”和“长波”。“长波”就是指50到60年之间的世界经济运动的过程。政治上的“长波”的变动有其周期性，我认为政治上50到60年“长波”的运动和经济上的“长波”有耦合之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也有西方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即所谓大国兴衰的政治“长波”。

我们看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1895年恩格斯的去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题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了科学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的著作，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

189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这个阶段的主题由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1945年经过战争的考验，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有俄国的实践，还有东欧其他国家的实践。如何取代的方式是多样的，但是如何取代的问题是主题。1895年之前有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俄国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探讨过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民粹主义者作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俄国的村社就是公有制的健全机制，在村社的基础上就可以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可以跨过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而俄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当时争论得很激烈，那时列宁还未成为列宁主义者，也对民粹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普列汉诺夫说，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所以对于民粹主义讨论的“过渡”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后来俄国又产生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认为俄国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以后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现在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过早了。列宁后来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十月革命后他取消了商品，取消了货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但到1920年他发现这个政策行不通。在1921年，列宁讲“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完全改变”。他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间接过渡的阶段，就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过渡阶段定义为“新经济政策”阶段，要有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完成这种过渡。现在理

论界很多人没搞清楚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政策，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阶段。所以列宁讲新经济政策可以有货币，可以有商品等，并不等于列宁承认社会主义可以有商品和货币，而只是过渡时期要有商品和货币。俄国必须要经历这个过渡时期，即间接过渡，也就是新经济政策阶段。列宁的贡献在于根据俄国的实际找到了如何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答案，即必须间接过渡而不能直接过渡。这是相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的。

列宁的贡献不仅在于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主题推向前进，他的贡献还在于如何取代的问题上，他由直接取代、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取代、间接过渡。我觉得这是他在如何取代问题上的两大贡献。在1945年以前直到1950年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由新民主主义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东欧一些国家也完成了这个阶段。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一直到20世纪末。这50年社会主义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斯大林提出世界上将存在两种并行的市场，所谓两种市场体系论。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另一种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因而出现了两个阵营的说法。这两个并行的市场意味着，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世界上可以同时存在两种世界经济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而没有交流与合作。但是“二战”后历史急剧变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以苏共二十大为标志，开始出现了人们后来所说的“解冻”，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不进行交流，不发生合作，而是相反，由于两大阵营的出现，这种交融也将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二战”后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追溯得早一点，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很多有作为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看到苏联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着。当时的计

划经济是有利于经济活动的。而西方社会运行几百年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却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才有了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新政”实际上改变了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传统，开始出现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个调控一下子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第一个摆脱危机走向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只是由于“二战”的爆发，这次实验没有进行下去。到了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此书被称为“凯恩斯革命”，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论，改变了市场可以自动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教条主义。凯恩斯认为，仅仅依靠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可能平衡。凯恩斯提出必须有政府的干预，必须有宏观经济调控。由此人们认为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也就预示着“凯恩斯革命”革了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命，革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命。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革命”改变了传统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理念，开始了现代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的突出之处就是把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列入市场经济的内在因素。“二战”后苏联继续推行计划经济，西方国家开始实施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甚至有国家计划的现代市场经济，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第一步。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信条”。有人提到，他的这篇文章是20世纪被引证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他认为没有经济核算的工具，这种经济是无效率的，而核算工具就是商品、价值和市场。“二战”后，米塞斯的设想，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采用，开始使用计划和宏观调控。1948年，法国提出了“现代化装备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以制订7到11年的指导性经济计划为基础的。除美国之外，各国都制订了相应的经济计划。这可以看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向东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学习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二战”后西方社会为了抵制社会主义的影响，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力量的兴起有关，也和西方一些激进主义党派的执政有关。如英国的工党执政后就推行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两项东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的东西。但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

拒绝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后来政治上的“解冻”引起了经济上的交往。

所以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交往越来越多。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对立的一面，但是也存在交流与合作的巨大空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有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我们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着我们和西方社会经济运行在机制和体制上交流与合作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有了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既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一面，又有二者合作与交流的一面。人们不再相信在同一个世界可以同时存在两种世界经济体系。1970 年，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有人把他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沃伦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断言世界经济只能存在一种体系，即当时现存的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还没有现在这么广泛。所以 1969 年和 1971 年多卷本的《世界体系论》发表时还是人们争论的问题。但 10 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世界上不可能同时并存两种世界经济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和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证明了这种观点。

按沃伦斯坦的观点，在世界体系论的结构层次中把世界各国按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国家，二是半边缘半外围国家，三是外围国家。有处于核心的发达国家，有处于半边缘半外围的中间地带的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还有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沃伦斯坦把整个世界勾画成这样一个体系结构，认为外围服从于半外围和核心，核心对外围和半外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世界体系从 17 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了，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被改变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能加入和参与这个世界经济体系。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了主题的转变。这种

转变就是由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转到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现在转到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矛盾、对抗和合作交流的局面下发展自身”的问题。从这个主题的转变，使得社会主义现时代的课题变得比马克思主义时代和列宁时代更为复杂了。他们所思考和研究的是—种社会“为什么取代”和“如何取代”的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仅是取代的问题，还有并存的问题，在合作和交流中推进自己的发展。假如我们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看做社会主义主要把握时间维度的社会主义主题，就是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取代，为什么取代和如何取代。这是从时间维度考察—种社会制度与另外—种社会制度的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不仅有时间维度，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空间维度的问题。这不仅有社会主义为什么取代和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还存在二者并存条件下的新的课题，这就是空间维度的问题。时间的维度我们只考虑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的维度要考虑空间上的并存性，即两种并存制度的交往、交流与合作，以及矛盾、对抗与危机。这使得社会主义主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就出现了分歧。有人只坚持时间维度的社会主义观，认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个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和如何取代的问题。把我们现在任何与资本主义的合作与交流都看做违背和背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时间的维度。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观中要破除和摆脱的观点，要把它拓展到空间维度的思考。但另外—方面，又由于空间维度的客观性，很多人看到两种不同制度的合作和交流，而否定它们的矛盾和对抗。由这种合作与交流推演到两种制度的趋同，又否认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时间的继起和时间维度的结论。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没必要也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由空间的维度而否定时间维度，进而得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放弃社会主义的结论。

今天我的学术演讲十分强调的就是：要把握当今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不仅在于认识社会主义主题的时间维度，我们现在教科书中大量讲的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还要把握现实中的

空间维度的新课题，要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交流与矛盾、对抗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使得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由时间维度上升到空间维度。而空间维度的确定并不否认时间维度结论的科学性，而是把空间和时间二者看作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所以在当今社会主义主题中对后一个即空间维度的研究是不足的。有的人只看见空间的合作并存而否定了矛盾和对抗，这种矛盾和对抗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怎样利用合作与交流，又清醒地看到矛盾与对抗，作出我们当今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选择，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的时代课题，也是我们探讨社会主义复杂性的根本所在。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言论，认为和资本主义的交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些人的思想还是停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主题，没有看到当今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提出了新的时代主题。

这种空间并存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还在探讨，还有许多未知的理论空间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这种并存就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讲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1640年开始有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60年才有了工业革命，到1880年才有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1880年至今才有了以垄断为主题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这个社会发展的漫长时期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会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并存。如何处理好合作、交流以及矛盾和对抗这样一个历史课题，就成为当今社会主义研究的极其复杂但又极其重要的课题。我想这些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我很乐意与大家共同探讨涉及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问题与回答】

1. 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习的一个方面。我想请问：在中国社会，福利已经发展五十多年了，为什么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我刚才说了，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的压力，开始推进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在19世纪末的德国就已经开始出

现了。德国的《济贫法》可能是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二战”以后更多的国家开始接受资本主义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济贫法》，迫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也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有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中出现了经济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与此相适应，为了能够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政府也推行了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作为缓解市场经济运行中因周期波动而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等问题，以及劳动力自身发展问题而建立的制度。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从撒切尔政府就已经开始了，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换句话讲，社会主义在世界力量开始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而且福利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减弱，西方也在大力度地减低本国的社会保障面和保障力度，因为外界政治压力消失了。我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解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上，当我们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原来寄予平均主义的社会保障的办法要相应改变；第二点，由于我们对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缺乏全面的理解，所以在改革中把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好的东西过多地取消了，使得我们出现了社会保障严重的不健全。我们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如今社会保障不力而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补救。

刚刚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有很大部分来阐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中的核心就是解决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就是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我赞成刚才那个同学所讲的，我们在对原有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把我们一些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改掉了。所以提到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失败能够引起社会这么强烈的共鸣，就在于把医疗卫生保障中原本好的东西取消了。而这些东西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在推行中。我们把市场经济无限延伸，延伸到市场经济可以解决社会中的所有问题，把医疗和教育也推向市场，引起社会上许多不和谐现象。我认为在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个失误集中在

人们对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严厉批评之中。对社会保障我们应该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西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因是复杂的，为了抵御社会主义的政治影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们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加鉴别地改正，已经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和谐现象。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说现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十一五”期间我们承诺，城市居民的95%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没有承诺农村的农民到底有多大比例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不全面的理解，包括更广泛地对“三农”问题的理解，我们还在寄希望依靠市场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可以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依靠市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涉及农村和农民的问题都是由国家统揽。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政府是解决农民问题第一责任人的时候，“三农”问题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2. 您能否分析一下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契合点和衔接点。这种制度真的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近代化乃至现代化吗？如果能，您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社会主义不管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理论。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过程。关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我认为是三条路径。

一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总会把中国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包括我们研究和探讨了世界落后国家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由不发达变为发达的时候，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解决本国问题。20世纪初列宁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确定，发达国家不可能允许不发达国家由不发达变为发达。所以对所有国家来讲，要求得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选择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的预言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实。

20 世纪初的发达国家到了 20 世纪末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换句话说，20 世纪所有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并没有由不发达变为发达。

我们原来推崇的亚洲“四小龙”，1997 年的一场金融危机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们不再认为选择西方的社会制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这不是我的判断。我在 1999 年访问泰国，当时的一位商务部长对我说：“泰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家不可能选择一个适合于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来求得本国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1997 年的金融危机迟早会给他们致命的打击。我的观点就是：20 世纪初的历史证明，后进国家要求得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是毫无指望的。

按照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绝对不允许在它的周边甚至在远方出现另外一些发达的国家。苏东剧变证明了这一点。波兰共产党垮台后的第一位总统兴致勃勃地跑到美国，要求美国给予波兰新政府以经济资助。他说已经按美国的要求推翻了共产党。美国的回答很干脆，确实给了波兰当时的反对党大量的经费支持，这笔经费在美国国会中有开支，开支的栏目就叫反共产党政权的特项支出。现在共产党已经垮台，在美国的经费支出栏目中没有支持别国经济发展这一项。因为波兰已不再是共产党国家，所以不能在国会经费中支出。至今，东欧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在慢慢地求得自身的发展。发达国家不是考虑东欧经济是否发展，而是希望这种变革让世界不再可能出现超过它们自身经济实力的其他国家。这是地缘政治学给我们的毫不留情的结论。包括美国对俄罗斯和东欧剧变前的支持后来都成了泡影，而对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在推翻共产党前给予了大量美元的支持。它有推翻别国政权的经费，但是没有支持别国发展经济的经费。有美籍华人跟我说，在他看来有些人不了解美国政府支持持不同政见者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为了别国的发展，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这样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一些选择社会主义的国家也遭受到了失败，但是不能反过来证明苏联选择资本主义就能够比现在更发展。只能证明没有哪个国家由于选择了资本主义由 20 世纪初的不发达国家变为世纪末的发达国家。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赶上了资本主义发达的最后一班车。相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许多国家

在世纪初是发达国家，但在世纪末却成为经济实力很弱的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同学们有机会到欧盟一些国家去，可以感受到那些国家经济力量的积蓄并不是靠最近几十年，而是靠“二战”后的二三十年，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相当艰难。我们看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都是几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2000年以后同时遇到了经济萧条的危机，至今没有摆脱这种危机的影响。我们现在到欧洲、美国访问，可以感到中国人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条道路的选择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把中国放到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所得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这是一条路径。

另外一条路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我们看到不仅是毛泽东同志，包括邓小平同志，他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能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说明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大家看到《毛泽东选集》，其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包括《邓小平文选》中也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念和观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代诠释。我们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讲到的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条路径的选择。

第三条路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包含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创造。这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都没有，而是根据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所得出的新的理论结论。这种结论只有在中国存在，在国外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和国外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交流的时候，他们部分地听懂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部分地又听不懂。因为这些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或者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我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的理念和特点，而且包含着浓厚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我们现在提的和谐社会，实际上也包含了这种思想。它还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百

年历史中进行独创性探索的理论和实践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纯粹把科学社会主义简单搬到中国实践。这就证明，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自身的实际，和中国自己的文化，和中国自己的独创性的实践道路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观。

至于刚才提到我们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我想这是个有待于历史证明的问题。但至少我们对现在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是越来越理智了，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1978年至今进行的改革实践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国人感受得比较深，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实际，推进中国的发展。而世界看中国是多方面的。他们看待中国的重要指标就是中国20年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奇迹，这种奇迹只有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才有过经济20年到30年长久不衰的进步。而中国现在正在实现着新世纪新的奇迹。中国假如再有5~1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足以向世界人民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这中间也包括我们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我们前20年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但是21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党更加关注国内外形势，更加从世界发展的全局看中国，更加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来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执政能力的提高符合时代的发展，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发展。

我相信我们选择的道路历史将证明是正确的。2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去欧洲，这几年走得更多的是知识阶层，确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学者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是中国在乞求世界，而是世界的发展没有中国的参与已经变得不可思议了。我想这就是一种国家地位的变化。作为中国人，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祖国是伟大的！

3. 您刚才提到近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球日益泛滥，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学家还以他们的产权理论、休克疗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来到祖国大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人对他们盲目推崇。我想请问如何解释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极力推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张五常热”这种现象。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看：第一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并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行，却和新自由主义走了许多相反的路径。新自由主义提倡的休克疗法我们是坚决不采用的。在 1988 年价格改革中有人提出过这个观点，但很快受到中央的批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和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休克疗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矛盾体。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发达国家内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经济发展或改革的旗号，而它却成为发展中国家改革的理论指导，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根本没有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指导思想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一开始就讲香港有一位学者否认中国有经济学家，我认为未免言过其实。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改革的关键时刻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理论观点，而这种观点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也解决了中国改革中很多重要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像斯蒂格里茨这样的学者，能够赞赏中国政府和很多学者，在中国改革艰难时期提出极好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政策。为什么这样一些学者的贡献我们看不见，这是我们现在体制上的问题，学者的理论观点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原因在于我们的很多政策只有变为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才能够真正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就使我们许多理论家的贡献被湮没，这是我们今后要加以改革的方面。比如讲我们现在讨论谁最先提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会认为是邓小平在 1979 年提出的，但是据我了解，1978 年就已经有人在国内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来了。当然我们也不会认为是邓小平听了那位学者的话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更不会否认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

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但假如追溯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人，那么应该是那个学者，可是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讲是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可能是我们理论研究规范上的不足。

至于张五常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实有人欣赏他的理论和言论，另一方面国内也有一些人在迎合所谓新思潮。现在有人对学术上的创新认为自己没听说过的就是创新，所以很多人认为张五常的说法就是创新，只要流行起来得到人们的赞赏，就认为有“卖点”。张五常对于自己在中国的言论产生的影响估价过高，对于决策层根本没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学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认为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创新的东西和积极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些受尊敬的学者，对这十多年来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估价过于悲观，我认为这也有失偏颇。我认为，对于一些倾向性的东西应该指出来，但过于悲观也没必要，不管如何我们的世界在发展，理论在推进，包括我现在在这儿和大家坦率地说这些话，本身就表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表明我们学术自由探讨的空气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会在高校中营造一种宽容、宽松、宽和的学习环境。我们会用自己的学术自由充分地使所有的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必须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在它的建设上必须符合宪法，是知识分子都会赞成的一种学术自由，而不是胡言乱语。

4. 现在在西方世界流行一种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有一个核心的观点，主张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工程，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保守主义又有人称为“第三条道路”。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美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越战引起美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变化，欧洲许多国家反对越战使美国陷入孤立。经济上，美国走完了战后20年的黄金时期，国内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美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发展到现在，这种思潮能否成为西方主流的或者准主流的思潮，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西方社会所遇到的矛盾，用新保守主义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布热津斯基早先写的《大混

乱》，开篇就提出了美国社会的矛盾以及今后解决矛盾的办法。当然这是非保守主义的办法。他说了两句话我认为非常中肯。第一，他认为社会主义失败并不证明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由此解决，这些矛盾都是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泡沫经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日本、欧洲同时出现的经济萧条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他点出了美国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核心问题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损害美国的最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新保守主义是无能为力的。针对这些矛盾，我认为新保守主义观点可以流行，但不会成为解决西方社会矛盾、维持西方社会统治的指导思想。我是持这样一个看法。所以新保守主义在西方也是几起几落，始终没有成为指导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我认为它会长期流传在人们中间，成为多种社会思潮中的一种，时强时弱地存在下去。

审美是人生的节日

演讲人：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北京社科联常委，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兼职研究员，《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编委。

童庆炳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文学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有：《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文体与文体创作》、《文学审美特征论》、《童庆炳文学五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创作美学》等 20 多部著作，发表论文数百篇。

北京的冬天大风呼啸，寒气逼人，四处光秃秃的，抬头望去，四处灰蒙蒙的，看不到美丽的景色。但我今天所讲题目却如此灿烂：

审美是人生的节日。在这个题目下我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人的审美活动是怎样形成的？第二，实现人的审美活动需要什么条件？第三，为什么又说审美是人生的节日？

一、人的审美活动是怎样形成的

有一种说法，美是客观的，因此只要有客观事物存在，美就自然形成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次美学大讨论，集中讨论的是“美”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好几派，其中有一派就认为美是客观的，说“美是不随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理解。美怎么是纯客观的呢？难道离开了人和人的情感会有美吗？难道在人类还没有产生之前，在荒山野岭中就存在什么美吗？谁认为它美呢？难道是恐龙认为它美吗？猴子认为它美吗？飞鸟认为它美吗？美永远是对人来说的。离开人，离开了人的情感，事物就无所谓美与不美。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所谓美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审美活动。

审美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活动。就它的范围来说，是很宽阔的。就它的形态来说是很丰富的。生活中处处都存在审美。衣食住行中都有审美（举例，连厕所也要讲究美的设计）。审美可以说是我们每日每时都要发生的事情。然而就实质来看，就高级形态的审美看，审美活动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的回答是，人的审美活动是人性觉醒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第一，美与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没有人和人性的觉醒，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审美活动。人从千万年的劳动实践活动中，使自身成为人，成为具有人性心理的人。例如人类最早的祖先——原始人——本来只有性的欲望和活动，如同一般动物一样。但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一点一点地改造自己，最终人的本能的性欲变成了具有精神品格的爱情，具有审美品格的爱情。人与动物就这样区别开来。感觉成为人的感觉。人性心理终于成熟，人的意识终于觉醒。人具有了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自然，包括外部的自然和人的自然，在人的意识、人性心理的主动作用下，终于可以成为人的对象。这样审美就是人的一种对象性的精神活动，因为人在审美活动中体现了人的意识、心理和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把自然当作人的对象，从而建立起了审美活动的机制。例如陆机《文赋》云：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不是简单的动物性的刺激—反应的关系。在这里对秋的萧条和春的生机的描写本身，把春秋景物作为对象，是主体的意识活动的结果。而“悲”与“喜”则更是诗人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表露。这里包含了对自然对象的体验、同情、理解、联想和想象等。这短短的两个句子，就是人的整体精神活动表征。可见人的本质力量与自然对象之间，在人性心理的作用下，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之日，也就是人的对象性精神活动展开之时。我们说审美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就在于在审美活动中，人把外部自然和人的自然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马克思语），这意思是说在对象中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力量得到了证明。如在对春秋景色的欣赏中证明了我们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区别客观存在与审美对象，当客观存在只是一种纯然的存在时，并不能为我的感觉所掌握，那就还不能成为我的对象，既然存在还不能成为我的对象，我与存在的关系也就还不能建立，那么审美活动也就还不能形成。中国古语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存在与人没有建立起联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这里马克思就音乐的欣赏，对欣赏中的“存在”和“对象”作了有意义的区分。马克思的意思是，音乐演奏当然是存在，但这存在就必然是审美对象吗？马克思认为，这还不能肯定。按马克思的说法，一支乐曲（任何审美客体都如此）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不被人们所欣赏，或由于主体缺少音乐的耳朵而实际上没有欣赏，这时候，它是毫无意义的，对这个主体来说，它不是对象，审美活动无法形成。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活动有待于主体与对象关系的建立。同样的道理，春天的景色是客观存在，但是如果“我”因为暂时无欣赏春天景色的愿望或我的欣赏能力有限，“我”不能把握它的美，因此春天的景色还不能成为我的对象，“我”与“春天的景色”没有建立起诗意的联系，那么“我”不能欣赏它，更不能用语言描写它，于是审美活动也就无法形成。我常去北京的香山，香山春天的桃花、夏天的绿树、秋天的红叶、冬天的松柏，还有那朝霞、落日、月亮、泉水、碧云寺、卧佛寺、黄叶村、琉璃塔等能不能成为我的审美对象，都有待于我与这些事物所建立起来的诗意联系。没有这种诗意联系，也就没有“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当然也就没有美，没有审美活动。常有这样的情形，我来到了香山，或因心事重重，或因身体不好，这时候，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香山成为陌生的事物，我与香山没有构成诗意的联系，它不是我的审美对象。

第二，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审美活动的形成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密切关系。人的实践是审美的源泉。没有实践活动，人的肉体的、精神的力量就不能得到确证，审美活动也就不能产生。一个小孩走在湖边，捡起一块石子，向水面投去，他期望出现他的作品，果然湖面漾起一圈圈涟漪，他看到自己的杰作，笑了起来，这就是审美。因为他的本质力量通过这次实践活动得到了确证，得到了对象化。

多年前我有一次学割麦子的经验。学习过程是掌握“真”的过程，运用这学到的“真”的本领用到多割麦是“善”，而我终于在割麦中产生了审美的感受，这就是美了。一个住在海边的果农欣赏自己果树上累累的果实，而不去欣赏大海，原因是果实是他劳动实践的作品。一个红军在经历长征的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不会想到美，但在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段经历，他一定会感到

那就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从而产生审美活动。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品，在他们战斗的时候，并不存在什么美，但日后深沉地回忆这场战斗就是审美活动，因为他们的勇敢、坚强、忍耐在这次实践活动中得到了确证。

二、实现人的审美活动需要什么条件

那么，人的审美活动的实现需要什么条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事情。总的来说，审美活动对人而言是瞬间的事情，但如果加以解析，那么我们要说，审美是人与物等各种结成诗意整体关系的产物。这整体关系由最起码的四个层面构成。

第一，审美要有主体层。审美的“审”，即观照—感悟—判断，是主体动作、信息的接受、储存与加工，即以我们心理器官去审察、感悟、领悟、判断周围现实的事物或文学艺术所呈现的事物。在这观照—感悟—判断过程中，人作为主体的一切心理机制，包括注意、感知、回忆、表象、联想、情感、想象、理解等一切心理机制都处在极端的活跃状态。这样被“审”的对象，包括人、事、景、物以及表达它们的形式，才能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化为主体的可体验的对象。主体的动作是审美的动力。如果作为主体的人没有“审”的愿望、要求和必要的能力以及主体心理功能的活跃，审美是不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活动的第一层是主体心理层。例如，我们欣赏毛泽东的诗歌《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风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们先要有欣赏它的愿望、要求，进一步要全身心投入，把我们的情感、想象、理解等都调动起来，专注于这首诗歌所提供的画面和诗意，我们才能进入《卜算子·咏梅》所吟咏的诗的世界。没有要求、愿望，即使有审美能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当然，在有了审美的愿望后，主体还必须起码的审美能力，若是连起码的审美能力和知识准备也没有，那么审美活动还是不能开展。这里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母亲的一个故事……这里是由于透视知识的缺乏阻碍了审美活动的展开，但也不一定对，因为她认为她的画像放在列祖列宗的旁边，要构成和谐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审美差异的问题。又如，欧洲

人往往不能欣赏《卜算子·咏梅》，因为他们那里不生长梅，没有梅的知识。

第二，要有审美客体层。现实事物或艺术中所呈现的事物，这是“审美”的客体。对于审美活动来说，客体层最重要的特征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和谐、对称、均衡、韵律、节奏、黄金分割、错落有致等这些形式方面的因素，而是客体的整体关系。对象的整体结构关系极为重要。格式塔质心理学的先驱者奥地利人爱伦费斯率先提出“格式塔质”概念。审美的对象与格式塔质的概念密切相关。“格式塔质”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奥地利的爱伦费斯举例说：我演奏一支由六个乐音组成的熟悉曲子，但使用六个乐音作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如改音调，从C调变成B调，或改用别的乐器演奏，或把节奏大大加快，或大大放慢等），尽管有了这种改变，你还是认识这支曲子。在这里一定有比六个乐音的总和更多的东西，也就是原来六个乐音的格式塔质。正是这格式塔质使我们认识已经变了调子的曲子。^①格式塔质不是作为一个因素而存在的。它是六个音的整体性结构关系，或者说它是作为经过整合完形的结构关系而存在的。如“56 5. 3 | 56 5-”在“大海，故乡”这首歌中，它不是单个音符的相加，它是整体结构所传达出的一种“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审美对象应该具有格式塔性质。有没有格式塔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美活动能不能启动。

格式塔质的实质就是各种关系的组合。审美在关系中，事物的实质也在关系中。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有事要步行去一个陌生的村子，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桃花村。村子在一个山坳里，不走到跟前是看不到的。我走了很久，走累了，喘着气在路旁坐下来休息。这时，从村子的方向来了一位驼背的老者，黝黑的脸上布满皱纹，皱纹像一页一页翻开的历史书，充满了生活的风霜雨雪。我连忙站起来，向他鞠了一躬，并问道：“老大爷，从这里到桃花村还要走多长时间？”老大爷似乎没有听到一样，继续走自己的路，那脸上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他是一个聋子或哑巴？我又重复了我的问题。老者还是慢慢地走自己的路，根本不理睬我提的问题。我有些生气了，但想到他可能是一个聋子或哑巴，也就消了气。甩开步子向陌生的村子

^① 参见杜·舒尔茨：《理代心理学史》，第297页。

走去。当我走出大概有几十步路的时候，老者突然从我的背后用铜钟一般响亮的声音喊了起来：“小伙子，到桃花村还要走 30 分钟。嘿嘿！半小时。”我回过身来，看见他微笑着，然后不等我感谢的话，继续弯着背慢吞吞地走自己的路。多年后，我明白了，我提的问题是：“从这里到桃花村还要走多长时间？”这个问题老者当时确实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他不知道我走路的速度，要是我像蜗牛那样爬呢，那岂不几天也走不到；要是我像兔子或羚羊那样飞跑呢，那恐怕连 5 分钟不到也就到达目的地了。到达桃花村的时间在于路程的长度和我的步子速度的关系上面。他一定要知道我步子的速度之后，才能估计我到桃花村所需的时间。在我甩开步子走时，老者肯定在仔细观察我步履的速度，然后才有那一喊。我这样想的时候，似乎看见了那老者额头上皱纹之间流动的是“智慧”之光了：到达目的地桃花村的时间，在于步子的速度与路程长度的关系。重要的不是关系项，而是关系，或者说关系重于关系项。我那时还不能如此明晰的学术语言表达。

实际上，对审美的客观层面而言，也必须要看对象的整体结构关系。离开整体关系这一点，也是无法谈审美活动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的古人早就有过思考。

早在公元前 369~前 286 年庄周的《庄子·天运》中就有这种思想的萌芽。这就是“西施瞶美”的故事：“西施病心而瞶（皱眉头）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瞶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之瞶美而不知瞶之所以美。”所谓瞶美，就是以西施皱眉为美态。西施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美人，她皱眉也是好看的。丑人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组合，也去学西施皱眉，结果丑上加丑，把邻居都吓跑了。这里就包含了整体结构关系的思想。

公元前一百多年，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主持编写的《淮南子》一书中说：厖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绣以为裳则宜，以为冠则讥。意思是说，酒窝长在面颊上是美的，要是长在额头上那可就不美了。五彩的绣花绣在裙子上是美的，如果要是绣在帽子上那可就不美了。这里存在一种整体关系组合。

同样的道理，作为审美重要对象的文学的艺术特点，不存在于文学的个

别因素中，而存在于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中。有了这种整体结构关系，作为艺术的文学才成为文学，离了它，文学就变成了一些人、事、景、物的堆砌。我的看法是文学整体结构关系与我们古代诗论中“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景外之景”、“像外之像”这些词语是很相似的。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到18~19世纪才明确提出这个思想，而我们的古人在7~8世纪的唐代就提出了这种理论。举一个诗歌方面的例子来说，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两句诗，这是真正的诗，历来脍炙人口。这两个诗句共写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六个景物。妙的是诗句仅由此六个景物构成，连衔接的动词都没有。如果把这六个景物孤立起来看，虽说也有言、有像、有意，但都毫无意味。但当这六个景物，经过诗人的“整合完形”，并被纳入这首诗的整体组织结构关系中时，在我们的感受中就创造了一种不属于这六个个别景物，而属于整体结构关系的意味，这就是那种溢于言表的“羁愁野况”的韵致，它已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性的东西，一种“新质”，即“格式塔质”。任何真正的诗，真正的小说、散文、剧本，都存在着这种“格式塔质”，正是它表现了文学的艺术特质，把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把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再举一句诗歌来说一说。大家看一看“群鸡正乱叫”，你觉得这句诗怎么样？大家一定会说这算什么诗。告诉你，这是杜甫的名篇《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一句，是写他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在经历了炮火连天的战争之后，在回到了家乡，见到了分离多年的妻子儿女之后，对和平生活的温馨感受和由衷赞美。在这里杜甫的诗是作为一个整体关系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句子存在的。美在整体关系中，个别句子的华丽、奇巧和圆润，并不一定就是美。《红楼梦》第三回写王熙凤迎接林黛玉进荣国府时的那句话——“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历来为人称道。人们分析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写尽凤姐的放肆圆滑和泼辣，道出凤姐在荣府中的特殊地位，令人咀嚼、回味。其实，如果把这句话从《红楼梦》的整体中抽出来看，不过是一句极普通的家常话，既无深意，也无诗意。原来，这句话的深意与诗意并非来自这句话本身，而是来自这句话与《红楼梦》整体的格式塔质关系，来自这句话与当时那特殊情景、氛围的关

系，来自这句话与王熙凤其他言行的关系。所以，美的意味在整体关系中。

第三，要有审美时空心境层。审美时空心境层又可以叫做审美“场”。“场”是指审美活动展开所必须有的特定的时空组合和人的心境的关系。“场”本来是从物理学中引进的一个概念。格式塔质心理学家认为，像电场、磁场、引力场一样，人类的心理活动也有一个场。审美场是由人与现实环境、主体与客体、情与景相契合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疆界的心理生活空间”。当然完整地讲这个“心理生活空间”，应包括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心境及三者构成的关系。如果有人问，暴风雨美不美？那是无法回答的。你还必须问：这对谁？在怎样的时空中？我小时候常上山挑柴，每当暴风雨来临，不论我正在山上砍柴，还是正挑着柴走在山路上，这对我都是灾难，我从未在这个时候认为暴风雨是美的。但是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安全，悠闲，但缺少刺激，这时我在高楼上，突然听见雷电的轰鸣，随后是那排山倒海般的风雨，我觉得那风、那雨像刘邦的《大风歌》一样的壮阔雄伟。暴风雨只有与审美主体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才可能是美的，孤立地作为“关系项”的暴风雨无所谓美不美。

月季花美不美？这也要看谁、在怎样的心境中、在怎样的时间和空间中。我小时候，从未觉得月季花是美的。月季花只有在适当的时间与空间的“语境”关系中，在与审美主体建立起某种关系时，才可能是美的。

第四，要有历史文化积淀层。审美的实现还必须有历史文化的条件。因为审美场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每一次实现都必然渗透人类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历史文化传统又渗透、积淀到每一次审美的实现中。人们总是感觉到审美活动让我们想起了过去的什么，似乎是文化传统凝结的成果。例如中国人特别欣赏松、竹、梅，这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我们欣赏《卜算子·咏梅》，就会联想起我们民族通过“梅花”比喻人的高洁、顽强，联想到我们祖先的坚强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一个欧洲人，一般而言，就不可能有这些联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活动的第四层是历史文化层。中国文学艺术有它特定的文化语境，不了解这个语境的人很难欣赏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

当以上四个层面构成一种完整协调的关系时，那就是人的审美和审美活动的实现，四个层面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一个层面，人的审美活动就不能实现。而且四个层面必须具有完整关系，审美活动才能实现。

概言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条件下，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于客体的美的观照、感悟、判断。审美实现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是多层面的整体过程。

三、为什么审美是人生的节日

现在来谈谈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审美是人生的节日。节日是什么概念？节日意味着与非节日的区别，意味着从平庸的世界进入一个新奇的世界，意味着从一个受束缚的世界进入一个自由的世界。节日起码有几个特征：

第一，节日是人所不能缺少的。人不能没有节日，没有一个民族是没有节日的。节日是民俗，民俗是民族的精神遗产。人是民俗的动物，是文化的动物。因此节日对于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像空气与水那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没有节日，人是受不了的。所以人们要制造各种节日。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像节日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人有一种欲望叫做美欲，这种欲望必须得到满足。人是会发生审美的饥渴的。想一想，八亿人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一个《卖花姑娘》是如何的轰动，又是如何的凄惨。

第二，节日的另一个特征是氛围感，是一个无功利的世界。人处在节日中，就进入一种兴奋的欢乐氛围中，甚至处于心醉神迷的境界，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超越功利的世界。审美中的人，也如同置身于节日的氛围中，恰好也有种兴奋的、忘我的、全身心投入的状态。这与人的审美在瞬间无功利是一样。

第三，节日的第三个特征，或者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精神自由和它对现成世界的正规性、压抑性、永恒性、不可改变性的消解，对于变动性、未完成性的肯定。如果说非节日是由现成的条文统治的话，那么节日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平民的狂欢，自由精神统治一切，可以犯规，可以出格，可以反常，可以颠三倒四，可以不顾等级的规定，可以摆脱一切刻板的条文。

这是一种乌托邦思维，一种超越时空的想象。如同在节日里一样，在审美活动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所谓“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是刘勰《文心雕龙》中论神思的话。这里我想给大家朗读前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一首题为“我想……”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想成为世界上各条大街上/所有的狗，成为所有海洋里所有的鱼。”“我想潜入/深邃的贝加尔湖，/憋着气/钻出/密西西比。”“我想爱/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也愿意成为一个女性，/哪怕只有一次……”看看在文学的审美创造中人可以获得多大的自由。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四个现代化，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需要第五个现代化，那就是赋予人的审美现代化。只有在审美中“人才成为人”，人才真正获得自由，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审美对人来说绝不是小事。

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问题探讨

演讲人：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浦劬，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部政治学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政治学科评议组副组长、全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会长等职。

王浦劬教授是我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出版《政治学基础》、《政治学原理》、《政治社会的系统分析》等作品多部，其中《政治学基础》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他曾多次赴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访问、讲学。

我所探讨的主题是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问题，这个问题属于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公共管理哲学理论，属于政治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核心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指导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谁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就应该可以成为名家。

围绕这一问题，我的讲演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要讨论公共性问题；第二，什么是公共性？进一步说，什么是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或者什么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性；第三，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是否存在着不同人理解的不同的公共性；第四，如果存在公共性，这样的公共性存在着哪些可以把握的特性？最后，简要探讨一下在政治发展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实现公共性的途径问题。

—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谈公共性问题，或者说讲这个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意义？概括地说，这种必要性大体有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主题的需要。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来讲，公共性本身也是它们特有的学科主题。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具备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才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存在价值。政治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之所以存在，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我们知道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权利和义务问题，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特有的研究主题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公共性，另外一个要素是权威性，所以，公共权

威现象，构成政治学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而公共权威对于社会的管理，则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公共管理从字面上解释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公共，另一个是管理。公共管理从管理角度来讲与其他类型的管理在技术方面差别不大，但是，由于其具有的“公共”两个字，就使得它区别于其他管理。因此，政治学和公共管理这两个学科的基本研究主题是围绕着公共权威现象进行的，而明确了公共性的含义，也就明确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

第二，回应社会、政治和公共管理现实生活的需要。研究公共性的必要，还体现在社会现实层面。在社会集体生活中，公共性一直是社会集体生活及其制度设计和运行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所谓由来已久，就是说两千多年前，中西方思想家关注或研究政治现象时，就关注到公共现象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实际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公共管理职能确定方面，公共性又是研究中西方不同政治思想和公共管理思想，研究按照这些思想设计的不同政府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中心环节，对此，可以用如下图所示的谱系加以说明：

0 ——— | ——— | ——— | ——— | ——— | ——— ∞

在该谱系中，左边一极设置为零，右边一极设置为无穷大。左边一极表示社会的公共性为零，即社会中不存在公共性，右边一极表示社会的公共性为无穷大，大到覆盖到整个社会。我们可以把公共性作一个这样的谱系分析。从这样一个谱系上可以看到，相关的政治制度设计、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潮的主张以公共性的大小为核心标准分布在这个谱系上，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曲线，可以把几乎所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相关政治思潮标示出来。当公共性状况在最左边即为零时，相关的政治主张典型是无政府主义。在社会集体生活和公共性方面，无政府主义有一个前提性预设，即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公共性，所以不需要以公共契约作为形式和制度。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另一种极端情况，即公共性状况在最右边为无穷大时，公共性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的所有利益要求，在这一公共性理解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主张及其政府管理模式，往往就是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就其表现形式来

看，它意味着政府和公共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覆盖和涵盖。从公共性的角度来解释，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公共性为无穷大，一直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和政治模式、政体设置和相关的政治哲学主张，而其他的政治模式、政体设置和政治哲学主张按照公共性作为基本的要素可以分布在这个谱系上。比如说，所谓的自由主义，就是只承认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点公共性，但是认为公共性并不多的政治主张。按照自由主义的经典说法，在集体生活中，大体上只有三件事有公共性：第一是报时，让大家同时知道准确的时间；第二是防火；第三是失火失窃后报警。这就是自由主义所说的守夜人的基本职能，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中公共性内容的认可。虽然有些学者把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说得很复杂，其实自由主义说的不过就是这点事，它所说的政府最低限度，其实就是公共性的最低限度。由此可见，从这个谱系来看，对于公共性的不同认知，是构建不同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进而构建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的政治思维出发点。

第三，回应学术探讨的进展，给出正确的学术方向和深入的研究结果的需要。公共性问题近来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它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和法学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对于公共性的探讨已有时日，并且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说法。在西方学者中，20世纪以来研究公共性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一位是美国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另一位是德国的社会思想家J. 哈贝马斯。这两位学者的作品传入我国，在学界和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学界，尤其是政治学、法学、哲学的学者，应该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通过自己深入认真严谨的研究，回应这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二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公共性，所谓公共性讲的是什么？公共性既然那么重要，甚至是一个学科的研究主题，是理解相关政体、各种政府管理模式和政治哲学主张的核心要素，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什么是公共性。

应该说，公共性是什么这一问题事实上是哲学问题，但是，它又并不纯粹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很现实的政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探讨也需要关照现实政治。但是，由于不同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因此，对于什么是公共性的看法迄今并没有一致和权威的结论。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有关公共性含义的主要理论和确定作一些介绍。

第一种解释认为公共性本身就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利益之和。这种利益要求就是公共性。按照这种看法，我们讲到中国国家利益时，就是 13 亿中国人的利益之和。个人利益之和形成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本身的要求和体现就是公共性，由此可见，公共性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构成的。

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观察这一解释，可以发现，关于公共性的这种解释，竟然秉持的是两种极端相反的政治哲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主张，近代自由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是按照个人利益之和理解公共利益的，他认为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实现和发展，就是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和发展。因此，自由主义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谓共同性和一致性因素，社会只是以原子化的个人形式存在的。按照这样的理解，单个人的利益得到了发展和实现，也就意味着公共利益得到了发展和实现。另一种是全能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虽然形式上处于与自由主义相反的另一极，但是，它对公共性和公共利益的理解也是按照个人利益之和进行的，即认为所谓公共性和公共利益，就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利益之总和。

对于这一解释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两种政治哲学都秉持有关公共性的这一解释，但是，实际上两者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这些个人利益的加总，因此，每个人的利益状况，决定着公共利益状况。而全能主义强调的每个人利益之和的总体状况，这种总体状况决定着公共利益状况，进而决定着每个人的利益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把公共性等同于所有社会成员所有利益之和的看法，其实基本等于把卢梭的“众意”等同于“公意”。

第二种解释并不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所有成员的所有利益加总形成的，而